

在

旅行中

· 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
作家的比较研究

拒绝旅行

黄万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
旅行中

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
作家的比较研究

拒绝旅行

黄万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比较研究 / 黄万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04-7159-2

I. 在… II. 黄… III. ①华人—作家—文学创作—对比研究—世界②华侨—作家—文学创作—对比研究—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7267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易 凡

封面设计 高丽琴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233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海外华文新文学几乎是跟“五四”新文学同步发生的，八十余年的历史产生了一代又一代作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其格局正发生着一些深层次的变化和调整。

1995年，陈大为主编的《马华当代诗选》出版，该书收诗15家，其中六字辈（20世纪60年代出生）诗人8家。翌年，钟怡雯主持编选的《马华当代散文选》，所选散文10人中有8人属六字辈。2000年，陈大为、钟怡雯等又主编《赤道形声——马华文学读本1》，收入45位作家的作品，其中34位是1960年以后出生的；而他们随后主编的《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2》所收文论39篇，其中近半数也出自六字辈后的作家。几乎同时，黄锦树主编的《一水天涯——马华当代小说选》也显示出相同的编选倾向和内容。这几本作品选问世以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学史界一般称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为“新生代”。上述事实表明，在一向被视为海外华文文学重镇的马来西亚华文（简称“马华”）文坛上，本土出生、成长的华人新生代作家正在崛起。他们中间正涌现出黎紫书、陈大为、黄锦树、林幸谦、鞠药如、李天葆、钟怡雯等一批创作成果斐然者，为世界华文文学界所瞩目，而马华前行代、中生代作家则有某种淡出之势。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发生在另外一些国家的华文文

坛上。

与此同时，另一支文化背景、人生经历迥异的文学新军也崛起于海外华文文坛，与华人新生代作家创作构成呼应，这就是新华侨华人（也叫“新移民”）作家。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由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而引发的“移民潮”，使20世纪初以来的海外中国移民人员的构成、流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全球化浪潮和中国大陆开放背景下出国的移民，没有跟前辈移民一样经历一个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痛苦而漫长的蜕变，明确的出国目的和追求使他们很快明确了自己的新华侨华人身份，在短暂的异国沉寂后，他们中一些人很快以新移民的身份在故土和异邦交织的想象中开始了海外创作，并产生了影响。

海外华人新生代作家（以下简称“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作家（以下简称“新移民”）是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对象。目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化，一是要继续拓展比较空间，丰富比较方法，进一步解决以何种文化体系、文学水准（中国大陆、居住国本土抑或西方）为参照系；二是更充分地关注海外华文文学作为跨文化语境写作的复杂交融、碰撞状态，研究其作为民族文化存在的丰富形态和面临的挑战；三是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中国大陆、中国台港澳、海外）有机联系的学术视野。这些深化，显然要结合一些新的对象的研究才能得以实现。而新生代、新移民文学正提供了这样一种研究对象。新生代、新移民文学产生于全球化语境，而又密切联系着华侨华人跟居住国各族群的关系、华侨华人在居住国所处地位和社会参与方式，其创作最能表现出“全球性和地域性兼备”的世纪之交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态势。同时我们还会注意到，新生代主要活跃于东南亚各国，新移民则主要崛起于欧美各国，他们各自创作的演变、特色，两者的关系

等又构成全球化语境中东西方文学的一种对话。这就使得本书研究具有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跨文化文学理论，乃至华侨华人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在以往的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中，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生存状态已受到了较充分的关注，并由此丰富着华侨华人观。但这种关注，往往将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移居整体来看待，所论及的往往是海外华侨、华人总体上的价值观念、生存状态等，如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变化等。然而海外华侨、华人在数百年的移居历史中，面对日益复杂纠结的世界现实，已有了“分化”、“分流”，其内部已产生了差异颇大的不同群体，并由此产生着一个民族或族群内部的跨文化因素。这种情况提醒着我们，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一般的甚至笼统的华侨华人总体观上，就会遮蔽了华侨、华人内部丰富的差异性，抹杀了海外华文文学跨文化语境的丰富的层次性，自然不利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入进行。本书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现状出发，选取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两个不同的群落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考察他们在海外华文文学所面对的共同问题上的不同走向，以说明海外华文文学内部跨文化因素的出现和积累，由此来深化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认识。

新生代、新移民各自作为创作群体，有其整体上的趋同性，但也存在着内部的诸多差异性。跟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生代作家的指称相近，华人新生代也大致指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海外华文文坛形成“代”群体影响的作家，跟“五字辈以上的现实主义拉开了距离”。新移民作家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国门禁锢了三十余年后的猛然洞开之中，不同年龄、出身、经历的人都投入了出国浪潮，使得新移民成分异常复杂。高行健、宗鹰、北岛等属于“文化大革

命”前的一代人，中国社会的变迁与个人命运的沉浮复杂纠缠在一起。张欣欣、陆新华、严歌苓、张戎、少君、李南央、杨瑞、林涓、章平、张翎等属于“老三届”，有过红卫兵或“知青”身份，“洋插队”是他们人生的第二次更遥远的漂泊。虹影、马兰、王小慧、欧阳昱、曹明华、陈瑞琳等跟新生代年龄相仿，其反叛性、超越性、独立性更强烈。陈谦、郭丹、吟寒、程宝林等，出生于60年代后或更年轻些，其成长伴随着现代网络社会的拓展，显示出一种更契合国际消费社会转型的创作取向。所以，对新生代、新移民作家的考察，既要梳理他们的群体趋同性，也要分析他们的内部差异性，更要关注每个作家的创作个性。

本书的写作，是希望通过对新生代、新移民文学进行清晰的描述和科学的、审美的分析，反映出海外华文文学格局的某种深层次调整，但更希望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在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理论等方面获得一些新的建设性材料，以推动这些重要理论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写作目的，本书在尽力梳理新生代、新移民的创作跟所在国环境的关系，他们的移民意识跟“五四”时期、20世纪40年代两次移民潮的移民意识有什么不同，他们在文学传统上跟他们的前辈作家存在着什么样的距离等内容的基础上，努力去分析新生代、新移民在身份寻求上表现出来的现实感、变动性及其中包含的悖论、矛盾，他们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及其处境，他们在历史、记忆中如何处理东方和西方、现实和传统的关系，他们在“边缘”中如何展开跟“中心”的对话，跟“他者”的互动，他们如何呈现世界语境中的乡土世界和民族语境中的世界潮流，如何对待建立融有“中国文学传统”和“海外本土文学传统”的“双重传统”，如何协调多元化和跨文化的关系等。在分析这些问题中，既揭示

新生代、新移民文学的生机、活力，也关注他们所面临的困境、陷阱，由此反映东西方华文文学跟中华文化承接的不同层面，以利于深入探寻民族新文学的生命机制。

为了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本书上编展开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的整体比较，下编则是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的个人专论。

目 录

前言 (1)

上编 全球化语境中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的比较考察

一 “出逃”:身份焦虑中的精神探求 (5)

(一) 新生代:久远传统、历史中的“出逃” (5)

(二) 新移民:时代断裂、文化夹缝中的“出逃” (17)

二 中国性和中华性:多元文化形态中的身份认同 (29)

(一) “中国”身份的强调和对主流文化的进入 (30)

(二) “同时拥有”中的“中国性”的丰富性 (38)

(三) 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矛盾冲突中的抉择 (44)

(四) 从“戒奶”到“断奶”:母体性和超越性的冲突 (50)

三 故乡和异乡:祖土文化情感和现实生存策略间的

矛盾冲突 (57)

(一) 异乡飘落和故乡重建的心境 (57)

(二) “故土”和“新土”:现实家乡和文化故乡的对话 (67)

(三) “古典”意象:母体归依和生命自审中的原乡

情结 (77)

(四) 历史叙事:心灵安置地的新构建 (88)

四 “边缘”和“中心”:放逐中生命归宿的一种寻找 (100)

(一) “边缘”放逐中的创作心态 (101)

(二) 新移民:在关注“边缘”的现状中构建与中心的对话	(106)
(三) 新生代:从关注“边缘”的历史中开掘“边缘”的力量	(115)
五 多元化和跨文化:传承和接纳中的文化融入	(121)
(一) 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境界	(121)
(二) 视角越界:跨文化的叙事身份	(131)
(三) 跨文化意识中的“异”视野和“异”形态	(139)
六 语言原乡:创作心灵栖息地的寻找	(151)
(一) 历史创伤和民族图腾、南洋幻想的象征	(153)
(二) 失语之痛中的身份构建	(161)
(三) 母语的回归与交融互动中的身份寻求	(166)

下编 多元对话中的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创作论

陈大为:新生代意识的诠释者	(181)
黄锦树的小说叙事:青春原欲,文化招魂,政治狂想	(188)
钟怡雯:山水兼得,情思双栖	(201)
严歌苓:语言的舞者	(209)
黎紫书:用文字投射生命无明的角落	(220)
吴耀宗:让小说慢跑的诗人	(235)
卢新华:从《伤痕》到《紫禁女》	(245)
章平:从天涯行吟到追忆往事	(253)
刘荒田:世故中的奔走,诗意里的回眸	(263)
陈谦:寻找中的激情	(271)
后记	(279)

上 编

全球化语境中新生代和
新移民作家的比较考察



旅外作家的创作一般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留学生文学，就是作家以留学生身份在异域进行中文创作，但其归宿都是回国，其写作大都以在国内出版作品，视国内读者为其对象为主要方式，内容上往往会将居住国华人华侨社会摒除于其视野之外；第二种是土生华人华侨文学，这种文学在欧美地区往往表现为非中文写作，读者对象主要是居住国民众，华侨华人社会不会成为其描述的主要对象，在东南亚地区，这种文学以中文和非中文写作并存的方式出现，这两种方式的描述对象和读者对象有很大不同；第三种是第一代移民的华文文学，这种文学往往以华侨华人社会为主要对象，作品既回中国出版，也在海外华人社会广为流传。

第一、二种文学都曾出现过文学巨匠。以旅日文学为例，旅日留学生文学催生了包括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在内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巨人；而日本土生华人文学则产生了被视为“日本文学国宝”的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和开创了日本“金钱文学”的文学巨匠邱永汉，但他们都已基本脱离了中文写作。在第三种文学中，又存在两类情况：一类是从“留学生文学”过渡到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如白先勇、於梨华、张系国等。另一类是运用双语进行创作的，如高行健、程抱一、赵淑侠等，对于其他作家来说，他们的处境会困难得多。这种处境的困难主要来自他们不能如第一、二种文学那样进入祖籍国或居住国的主流文学，在异国仍坚持华文写作，使他们不得不一直处于“边缘”。然而也恰恰是他们的创作处境，最能反映出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活力和困境。

新生代、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反映出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活

力和困境。新生代属于土生华人，但他们坚持用华文创作，这使他们大多数人的创作至今被视为居住国的少数民族文学，而难以进入国家文学的主流。新移民作为第一代移民，又不只是以留学开始移民生涯，不少人生活充满了艰难，其生存也只能是异域的边缘状态。然而，不管是新生代，还是新移民，他们的创作都充满了勃勃生机。

H. 米勒曾用“理论在翻译中旅行”和“文学作品拒绝旅行”来概括当前文学所处的语境^①，一方面，虽然几乎每一种理论都孕育于某一特定的区域文化，却不断在“扩张”中阐明自身的普适性、充分有效性；另一方面，用任何一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都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它们甚至害怕在翻译中失落自己，所以它们从本质上“拒绝旅行”。这恐怕就是米勒说的“兼备地域性与全球性”。而当世界在政治、经济等层面上越来越难以抗衡“全球化”冲击时，恐怕只有在文学中才能寻找到这种“兼备”的力量。新生代、新移民创作产生于这种背景中，他们比前辈更渴求跟世界对话，他们也比前辈更执著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是“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和在“拒绝旅行”中“旅行”的一群。

历史上漂洋过海的华人“都以庙宇最先登陆上岸”，以故土的“神明”安定异乡心灵；之后以“会党的、血缘的、地缘的、业缘的等”组织聚合起华族各种力量，以传统的人际社会构筑面对陌生的异域环境；再后，就以创办教育等方式来维系、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岁月流逝中传递“香火”，聚合人心。这种

^① [美] H. 米勒：《作为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梁刚译，《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28页。

安心托身的“原级性”方式^①，源自汉民族祖先“立国建邦”的历史。生育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中的新生代，从父辈那里接纳最初的历史意识。而新移民却不用承受这种历史，他们登岸异国，一开始就得面对居住国的生存、竞争机制，他们的未来甚至决定于他们跟“历史”的告别。

新生代土生土长于居住国，国籍、身份明确。但他们多半有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或他国求学的经历，有着出入于汉语主流和其他语种社会的经历，从中体验着“放逐”。新移民作家自身属于“第一代移民”，国籍、祖籍，原产地、现居地，都以鲜明的记忆和现实色彩交错重叠，或明或隐地引发着其身份的模糊。他们从汉语主流社会进入汉语非主流社会，大多出于自觉的“放逐”。新生代和新移民的放逐之痛、寻求之声，既回应着全球化浪潮，又偏爱于族裔、边缘、传统一类的话题，他们创作的勃勃生机正来源于他们在全球性背景下选择的独特性话题。

^① 余光中：《狸奴的腹语》，收入〔马来西亚〕钟怡雯《听说》，（台北）九歌出版社2001年版。



一 “出逃”：身份焦虑中的精神探求

（一）新生代：久远传统、历史中的“出逃”

我们首先从新生代、新移民笔下反复出现的一种“出逃”来审视他们身份焦虑的丰富内涵，以呈现他们创作的独特话题及其包含的生机。

新生代作家笔下出现的“出逃”是一种从久远的传统、历史中的出逃。新生代主要生活的东南亚华人社会跟欧美华人社不同，其一直努力于“土生社会的传统化”，也就是说，它更畏惧自身被“原住民族”同化，又无法靠新移民来“新陈代谢”，它必须基本上依托自身蕴蓄的力量，在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多代中传承华族传统，这就造成了东南亚华族社会自身传统的封闭、稳固。历史的久远、传统的深厚，会弥漫出神圣、肃穆，蕴蓄着恭谨、慎敬，也会催生出恐惧、“疏离”。新生代似乎更多恐惧、“疏离”。1969年生于马来西亚的钟怡雯（著有散文集《河宴》、《垂钓睡眠》、《听说》，论文集《莫言小说：“历史”的重构》、《亚洲华文散文的中国图像》，主编有《马华当代散文选》、《赤道形声——马华文学读本1》等）被余光中美誉为“得兼天才、毅力，成就

了学者兼作家的双赢正果”^①，她的散文《凝视》也被余光中推崇为“真正诡奇而达惊悚境地的杰作”^②。散文描写年幼的“我”跟去世的曾祖父母之间经常发生一些“日常魔幻”的事件，而这一切得以一再发生，就因为“我”一岁时，曾祖父、曾祖母就去世了，四世同堂未留给“我”任何一点亲情的温暖，只有隐伏的敬畏伴“我”终日。一旦曾祖父母成为一种纯然的传统、凝固的历史，那么，“我”凝视他们的遗照所能接收到的信息就只有责怪、惩罚了，于是，两老的眼光无所不在，“任凭我走到哪里，都被盯着，眼神简直就像贴我背后一般”。但初生牛犊的“我”，仍有办法化解来自祖辈的戒慎恐惧。过年大扫除时，家里派定“我”清扫祖先的供台，尽管“我”实在没有勇气把鸡毛掸子拂到照片上，越靠近照片，他们的表情越严肃，五官咄咄逼人，然而“我”颤抖的心理仍在“不停地盘算，如果鸡毛逗出了他们的喷嚏，我该往哪儿躲”，这种儿童恐惧，会引发笑声，轻而易举瓦解了维系了三代的祖辈威严。接着，“我”在曾祖父的照片后面，发现了颗小小的壁虎蛋，其中竟然有只小壁虎破壳而出，那吃力挪步的极小的动作，似乎在两老冷峻的眼神、嘴角上搅起一丝笑意，祖辈毋庸置疑的权威被这小小的生命彻底倾覆……当钟怡雯在文章结尾写道：“那次大扫除好像一个告别仪式，永别那段被凝视的日子。可是凝视的力量却从未停止……”人们读到的是一种要告别“原乡”、走出传统的心灵祈求。^③

① 余光中：《狸奴的腹语》，收入〔马来西亚〕钟怡雯《听说》，（台北）九歌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同上。

③ 王康武：《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转引自〔马来西亚〕黄锦树《东南亚华人少数民族的华文文学》，《香港文学》第221期，2003年5月。

在钟怡雯的笔下，“逃离”不断地出现，而要逃离的常常是在一般人记忆中显得温馨的童年，例如，《渐渐死去的房间》记忆“我”幼时居住的宅院：“多少年后，我依然记得那种气味……那混浊而庞大的气味，像一大群低飞的昏鸦，盘踞在大宅那个幽暗、瘟神一般的角落。”《芝麻开门》中，童年那口“带着青苔的清香”的古井，却使“我”“逃逸”到“一潭混浊的积水”面前，而那“芝麻开门”的童话也成了一种包含着无处容身的恐惧的童年“咒语”。钟怡雯的这种表达也出现在其他新生代作家笔下。如希尼的诗《火烧河上的童年》写“浴水的童年”，“童真”已无法“隐藏几个阿里巴巴”，“溺毙”、“迷路”，“烧得干干净净”……童年的毁灭预示着传统的消亡、族群的凋敝、文化的式微……吴耀宗的《涉及童年和蜥蜴的四行体》所抒写的童年“蜕旧”也是一种相伴终身的创伤，“蜥蜴断尾”是逃窜，是抉择，是自戕，是求生……当新生代作家笔下的童年，已不是“昨日”、“记忆”、“稚爱”、“旧梦”这样的字眼所要寻回，反而成为要逃离的“梦魇”时，实际上这种表达已具有了极有代表性的象征意义，呈现了新生代对传统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发生并不只是在后现代的世界性背景上，更有着东南亚华人社会转型的背景。

早在1970年，王赓武就新马华人的分化提出了著名的“三集团说”。“三个政治集团中的第一个是甲集团，它与中国的政治保持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并总是关注着自己和中国的共同命运……第二个是乙集团，它由精明而讲求实际的多数华人组成，他们关心的是贸易和社会集团的低姿态和间接政治……第三个是丙集团，则是一个小而不稳的集团，因为它不能把握自己的特性，但一般都抱有对马来西亚的某种忠诚。”

到了1987年，陈志明根据教育源流的不同，分析了马来西